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一五五〇年前的 中国基督教史

〔英〕阿·克·穆尔 著 郝镇华 译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一五五〇年前的 中国基督教史

〔英〕阿·克·穆尔 著

郝镇华译 蒋本良校

中 华 书 局

1984年·北京

责任编辑：谢 方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

〔英〕阿·克·穆尔 著

郝镇华译 蒋本良校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12⁵/₈ 印张·1插页·252千字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册

统一书号：11018·1277 定价：1.20元

中译者序言

本书作者阿瑟·克里斯托芬·穆尔 (Arther Christopher Moule), 英国人, 生于 1873 年, 1955 年去世。

穆尔是英国著名的东方学家, 基督教史学家。他最初是一位建筑师, 后来作为基督教传教士于 1898—1908 年在中国传教。1908 年回国, 在英国仍担任教职。1933 年以后, 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学。1933—1938 年, 任剑桥大学中国语言及历史讲座教授。1940—1945 年, 任曼福德大学校长。

穆尔的主要著作有: 《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1930 年); 《马可波罗游记校注》(1938 年)(与伯希和合著)。

本书所述时代, 包括从唐贞观九年(公元 635 年)至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 1550 年)这一时期。本书所说基督教徒, 实指唐代景教、元代也里可温和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传入中国的罗马天主教所属方济各会。

本书用大量史料, 向我们展示了中国早期基督教九百年间的兴衰史。唐代景教是古代基督教的一派, 此名初见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碑文云: “真常之道, 妙而难名, 功用昭彰, 强称景教。”景教于公元五世纪产生于拜占庭, 其创始人 of 聂斯托里, 所以也称聂斯托里教。聂斯托里原为叙利亚神甫, 公元 428—431 年任君士坦丁堡总主教, 因其学说与当时流行的基督教义不相一致, 遂在公元 431 年以弗所会议上被谴责

为异端。聂斯托里被逐放，其教徒逃亡波斯，景教遂由波斯传播至中亚，并于唐贞观九年，由叙利亚人阿罗本传入中国。

唐太宗时，唐朝声威远震中亚，西域诸国相率来朝，长安一城，万国辐凑。波斯和阿拉伯诸国人或使节或商旅或僧侣，经西域进入中国。贞观九年，阿罗本首途长安，译经传教，迄高宗时，已是“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可见当时景教之兴盛。高宗去世，武后执政，武则天信奉佛教，其他宗教受到歧视，景教自然也不例外，但仍流布未衰。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下诏灭法毁寺，此举也波及大秦（景教）、穆护、袄等教。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会昌灭法”。此后，景教徒多被勒令还俗或回归本籍，不愿回籍者则多改习中国学术和诗文，希望应举服官，或皈依其他宗教。自此，景教在中国内地销声匿迹。景教在唐时流传二百一十年，而今可供考证者仅《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及敦煌鸣沙山千佛洞景教经文寥寥数卷。但在五代和北宋政权鞭长莫及的中国西北边陲，仍有景教流行，如蒙古的克烈部、乃蛮部和汪古部以及新疆的回鹘人等依然多奉景教。

基督教在元代称为也里可温，此名在赵州柏林禅寺圣旨碑所录元太宗五年（1233年）诏书中已有记载，元代史书中也屡见不鲜。

在元代，蒙古政权扩及欧亚两洲，中西交通大为畅通。原处西北边地多信奉景教的克烈部人、乃蛮部人和汪古部人以及畏兀儿人向内地迁徙，原居北高加索山麓信仰景教的亚速人（亚兰人），也随蒙古军至中国。此外，西域诸国流寓中国者日益增多，中亚景教徒也东入中土。在元代，西域人入华初建景寺者为马薛里吉思（阔里吉思）。马薛里吉思来自薛迷思干

(撒马尔罕)，至元年间为镇江府路副达鲁花赤。他在至元十六——十九年(1279—1282年)兴建景寺六所，即镇江大兴国寺、云山寺和聚明山寺，丹徒县的四渎安寺和高安寺，后又在大兴国寺侧建甘泉寺；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休官后在杭州荐桥门又建大普兴寺。当时的景教寺称“忽木剌”。在元代，除景教外，尚传入罗马天主教。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蒙特·科维诺来华传教，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抵汗八里(北京)，大德二年(1298年)在北京建立第一所天主教堂。教皇克列蒙特五世闻约翰在中国传教勋绩卓著，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特设汗八里总主教一席，由约翰充之。同年教皇为襄助约翰，复派主教哲拉德、裴莱格林、安德烈、尼古拉斯、安德鲁梯斯、赛福斯托德及威廉等七人携诏书来华。皇庆二年(1313年)，只有哲拉德、裴莱格林和安德烈三人到达汗八里。越五年，约翰派哲拉德赴刺桐(泉州)任主教。哲拉德去世，延祐五年(1318年)，裴莱格林继任刺桐(泉州)主教。至治三年(? 1323年)，裴莱格林去世，安德烈继任刺桐主教。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安德烈去世。据记载，基督教在元代领洗者有三万人，元廷为管理景教，还设立专官崇福司。但元代信奉基督教者，大抵皆为中国西北诸部人和西域来华诸国人。1368年元朝灭亡，这些人或远逃塞外或回原籍。此后奥托曼土耳其兴起，西域孔道为之堵塞。从此中国基督教也随之消失。越二百年，即迄1582年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中国的基督教才又重新出现。

作者在《前言》中声明，他拟将1550年以前有关中国基督教徒的中西文史料译成英文，收集成册。作者治学态度是比

较严谨的，如选择史料，主要以正史、手稿、碑铭和方志为准；在采用历史传说和游记时，总是寻求旁证；有多家之言和怀疑，必溯其流变，辨其真伪，决不陈陈相因。如作者在做了大量考证之后，否定了数百年来在西方基督教史书中广为流传的耶稣门徒圣多默(St. Thomas)来中国传教的故事；指出一些游记所载杭州有“一万二千座桥”乃是夸张之词。再如有些记载尚难证实真伪时，作者不加妄评，而作为一家之言保留之。但由于作者是传教士，本书是站在传教士的立场上编写的，在资料的编译和说明中也常带有宗教色彩，这方面也请读者留意。

作者编撰此书时，查阅了大量中文著作，其中重要史籍有：《唐会要》、《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宋史》、《元史》、《元典章》、《元通制条格》等等。方志有：《开封府志》、《长安志》、《泉州府志》、《至顺镇江志》和《淳祐临安志》等等。佛经有：《大正新修大藏经》、《贞元释教目录》等等。这些中文著作，虽然提供了有关中国本土基督教活动的大量记载，但关于来华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记述颇少。作者为了补充中文史料之不足，验证中文史料之记载，又查阅数十种西方重要文献。其中教会史著作有：《梵蒂冈手稿古著新编》、《传教会手稿集》、《基督教会早期传教史》、《方济各会史家集》以及弗朗多著《多明我会日本和中国等国传教史》等等。此外还参考了多种游记，如《古代印度中国游记》、《阿布·泽德游记》、奈德托的《马可波罗游记》和拉缪肖的《航海与旅程》。在作者所引西方史料中，有更大价值的是下述原始材料：《梵蒂冈教廷档案手稿 I. Vii, 262》、《阿息西公共图书馆手稿 314》、《伦敦大英博物馆科顿手稿 Nero A. 9》、和《巴黎国家图书馆拉丁

文手稿 5006》等等。这些原始资料，保存了罗马教廷与元蒙皇室的来往国书以及西方驻华传教士的书信。

本书第四章《马·雅巴拉哈三世和拉班·扫马》是关于我国元代景教徒西行的重要记载。雅巴拉哈原名马可，与扫马同为元代畏兀儿人，皆景教徒。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二人出发西行去耶路撒冷朝圣。1281年，马可在波斯被选为景教法王，称马·雅巴拉哈三世。1287年扫马奉伊尔汗国国王阿鲁浑之命，出使欧洲，晋謁罗马教皇、法国国王和英国国王，敦促其出师，与东方联合，夹攻埃及。中西交通史上的这段重要史实，不见中文记载。此二位景教徒的传记，最初是波斯文，后不见流传，现尚保存叙利亚文译本，1888年在巴黎首次出版。1895年，夏博的法文译本《马·雅巴拉哈三世和拉班·扫马修士传》问世；1927年，蒙特戈麦利的英文译本《雅巴拉哈三世和扫马的历史》在纽约出版；翌年，布哲依叙利亚文本译为英文，题为《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两个僧侣》，伦敦出版；1932年，佐伯好郎依布哲的英文本译为日文，书名为《元主忽必烈派遣赴欧景教僧旅行志》。这一章是对元代中外关系史的重要补充。

我国在本世纪初，始发现唐、元时代景教文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云：“太宗文皇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据此可知，唐代景教必有中文译经流传，但究为何经，不得而知。清光绪末年，英国斯坦因至甘肃考古(1907—1908年)，于敦煌鸣沙山千佛

洞盗去古代写卷一批。1909年,法国伯希和又至,复盗去大量写卷,包括景教经文《三威蒙度赞》。宣统二年(1910年),清学部大臣命甘肃总督传令敦煌知事,将石室所藏残卷运往北京,在经手过程中,又有些景教经卷落入私人之手。从伯希和所获《三威蒙度赞》后所附《尊经》得知:“大秦本教经,都五百三十部。……大德僧景净译得已三十部卷。余大数具在贝皮夹,犹未翻译。”据此确知,至唐建中年间,至少已有三十部中文景教经在中国流传。迄今所见,国内外学术界已公布的敦煌石室唐代景教中文经典共八篇,作者在本书中只著录其中三种,即《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三威蒙度赞》和《尊经》,对《序听迷诗所(诃)经》只作了部分译述。译者为了全面反映本世纪以来在中国发现的景教文献,补充本书之不足,在本书译文之后特辟《附录》一节,收录了此书未收入的敦煌石室景教中文译经五篇:《一神论》、《宣元至本经》、《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志玄安乐经》和《序听迷诗所(诃)经》。另外,收录了首次译为中文的两篇叙利亚文景教经文,即《新疆高昌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祈祷书断片》和《北京午门城楼上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前后唱咏歌抄本》。译者在每篇附录之前,对其发现与收藏之经过作了简单说明。

本书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蒙张幼华、张文凯和陈书梅诸同志的热情帮助;译完后,蒙陆峻岭先生审阅,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又蒙蒋本良同志作了校阅,在此均致以诚挚的感谢。

郝镇华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外关系史研究室

1982年3月20日

目 录

中译者序言	(1)
前言	(1)
第一章 导论	(3)
第二章 唐朝	(34)
一、西安基督教碑	(34)
二、敦煌景教《三威蒙度赞》	(59)
三、敦煌发现的其他文献	(65)
四、有关基督教徒和基督教的若干单独史料	(71)
第三章 刺桐的十字架及其他遗物	(85)
第四章 马·雅巴拉哈三世和拉班·扫马	(108)
第五章 《马可波罗游记》摘录	(147)
第六章 镇江府的基督教徒	(166)
第七章 方济各会	(189)
第八章 蒙古帝国时期的中国基督教徒 ——根据东方史料	(245)
第九章 十四世纪的西方作家:	
一、波尔德诺内的鄂多立克	(271)
二、《大汗国记》摘录	(280)
三、《约翰·马黎诺里游记》摘录	(282)

附 录

说明	(297)
一、一神论	(299)
1. 喻(谕)第二	(298)
2. 一天论第一	(301)
3. 世尊布施论第三	(307)
二、序听迷诗所(诃)经	(315)
三、宣元至本经	(321)
四、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	(324)
五、志玄安乐经	(326)
六、新疆高昌发现的叙利亚文 景教祈祷书断片	(332)
七、北京午门城楼上发现的叙利亚文 景教前后唱咏歌抄本	(342)
重大事件年表	(355)
索引	(359)

插图目录

1. 公元 781 年西安景教碑上的十字架
全图 (33)
 这张照片由塔姆斯先生摄自一拓本。
2. 崇仁寺平面图，位于西安西门外五里，西安景教碑
 1625—1907 年置于此 (35)
 此图原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杂志》
 1910 年。
3. 长安和西安。这张平面图大致表明了现代西安和古长安的关系、公元 638 年教堂的位置和景教碑的位置。
 这张图是根据《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一张很好的现代平面图和夏鸣雷的文章(载《汉学札记》第 12 册第 116、117 页)编制的..... (39)
4. 西安景教碑标题铭文。这个标题是从一件拓本上援下的，此图为全图的八分之一 (41)
5. 《唐景教碑抄本》的一页，是 1625 年 6 月在杭州刻印的。此页摄自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本。这页包括公元 638 年的皇帝诏书..... (44)
 这张照片是卡塔拉兄弟摄的
6. 景教《三威蒙度赞》的中文原件，是八或九世纪的一份
 三页纸的手稿，1908 年伯希和教授发现于敦煌。感

谢伯希和教授，他借给我这张照片并允许我
复制 (60)

照片是庞斯先生摄的。

7. 《序听迷诗所(词)经》最后二十行，这是在敦煌发现的一份手稿，现由高楠顺次郎博士保存 (68)

8. 泉州第一个十字架。据说这是 1619 年在泉州附近的南安西南面的西山上掘出的十字架，1638 年被一些基督教徒发现 (85)

这张照片是徐家汇图书馆员提供的，是从
《唐景教碑颂正铨》(1644 年版) 的木刻版
摄下的。

9. A. 泉州十字架。1638 年在泉州东门外一英里东湖岸发现的一个十字架

B. 1638 年在泉州城内水陆寺发现的一个十字架 (86)

照片来源同上

10. 莫雅 1906 年在泉州发现的一个十字架；此照片由阿尔纳兹(P. G. Arnaiz) 摄，公布于《通报》(1914 年第 644 页) (88)

《通报》编辑和发行者准许我复制。

11. 房山县十字架图。这两个十字架 1919 年发现于房山附近的十字寺。中央就是这个相当大的叙利亚铭文 (98)

这张照片由塔姆斯先生摄自一拓本。

12. 十字徽章 (106)

13. 中国元代景教徒拉班·扫马和马可西行纪叙利亚文本的一页(载罗香林著《唐元二代之景教》——译者补)……………(109)
14. 马可波罗手稿Z中叙述福州基督教界的一段话。这段话只见于最新发现的米兰手稿Z中。这份手稿的日期是“1795年7月8日”。现已证明,这是在14世纪末或15世纪初写于纸上的一份手稿的副本,当时的收藏者是哲拉达红衣主教,现在应藏托勒多牧师会图书馆,但未找到……………(163)
- 这张照片是赛萨尔·帕金尼公司的,是阿姆斯特罗西亚图书馆馆长允许我复制的。
15. 大兴国寺碑文。这是1333年《至顺镇江志》(1842年版)第9卷第8、9页的一部分……………(167)
- 照片是庞斯摄的。
16. 约翰·蒙特·科维诺第一封信的一部分,见巴黎手稿P(国家图书馆,拉丁文5006)……………(198)
- 这张照片是国家图书馆友谊会提供的
17. 泉州城。《泉州府志》(1612年版)中所载泉州及其附近平面图,其中标志着方济各会教会和那里发现的十字架(本书图8、9)的可能位置……………(219)
- 这张照片是弗列明公司摄的。
18. 《喻(谕)》第二手稿前十一行(原载佐伯好郎著“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第160—161页,东京1951年版)
- 译者补……………(299)

-
19. 《一天论》第一手稿前十一行(原载佐伯好郎著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第 174—175 页)——译者补 (302)
 20. 《世尊布施论》第三手稿前一部分(原载佐伯好郎著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第 206—207 页)——译者补 (308)
 21. 《宣元至本经》手稿后三十行(原载佐伯好郎著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第 312—313 页)——译者补 (322)
 22. 《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原载佐伯好郎著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第 314—314 A)——译者补 (325)
 23. 新疆高昌景教叙利亚文祈祷书片断(原载罗香林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 1966 年版)
——译者补 (333)
 24. 北京午门城楼叙利亚文景教前后唱咏歌抄本第一页
(原载罗香林著《唐元二代之景教》)
——译者补 (343)
 25. 元代西方和中国著名旅行家行经路线图(原载佐伯好郎著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第 352—353 页)——译者补

前 言

中国在公元初期和中期已有基督教徒，本书拟将这方面能得到的证明史料收集成册，并将各种原著中的原文译成英文，尽量避免作任何概括、摘要或者表述个人意见。文中的重要参考书和必要的解释，均见脚注。但即使做到上述各点，本书仍不完备，因为有关证明古代中国存在基督教徒的史料已经积累很多，欲加整理非我的时间和精力所及；还因为篇幅所限，有时只能提供一个参考书目和摘要，以代替全文，这种情况特别见于第八章。

对许多朋友给我的热心帮助，我想都已在适当地方及时表示了感谢。已故的亨利·裕尔爵士和仍风华正茂的保罗·伯希和教授对我的赐教，几乎在每一页上皆可清晰见到。我从伯希和教授得到的友谊和鼓励对我的益处，我以为胜过他出版的书籍所提供的许多参考材料。我更感谢我的父亲以及已故的爱德华·沙畹教授、我的兄弟乔治和亨利；我还要感谢包括 G. K. 龙 (Leung)、S. 邹 (Zau) 二先生在内的其他许多人，并通过他们向素不相识的、对我有所帮助的中国人致谢。此外，我还要感谢大英博物馆、巴黎国家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的职员们，感谢沃斯和克朗普顿先生，感谢为我提供插图的摄影师，特别感谢杭州的 R. F. 费奇博士，他允许我用他的美丽的灵隐寺照片作卷首插图。

我还要感谢《东罗马评论》的编辑 P. 塔奇·温图利牧师和其他杂志的出版者和编辑，他们慨然允许我使用他们各自刊物上发表的材料。东方读物出版社非常热情的借给我一些汉文铅字。最后对我的妻子表示谢意，她在校对清样和编写索引方面给我很大帮助。

本书可能使某些人失望，因为本书没有追述在这个国土上成长、发展和逐渐确立的某个基督教会的遥远起源，而只记述了不同时期和不同数量的、事实上或名义上的外国基督教徒在中国居住时的活动，虽然记述中将至少包括两个大的、可是令人失望的福音会的经历。本书也不打算探讨基督教对佛教和中国人思想可能有过的影响。已故的提摩太·理查德博士说，有一篇著名的佛经就是“亚洲式的我们救世主耶稣基督之福音书”；佐伯好郎教授说，“唐代中国实际上——虽说名义上不是——处于基督教影响之下”，可是迄今为止，没有公布出什么材料证明他们的说法。

对我来说，一致用威妥玛拼音法写汉字是容易的，但对亚洲的拼音文字进行直接译音就感到非常困难，在专家们看来也可能是错误的和不一致的，为此谨表歉意。我希望将来有一种统一的汉字拼写法能将由于删去中国字而造成的混乱减少到最低限度。有数条重要原文是复制的。

阿·克·穆尔